

陶澍生平相关事项的几点歧义与辨证

易永卿^{1,2} 陶用舒²¹

(1. 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, 北京 102488;

2. 湖南城市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, 湖南 益阳 413000)

【摘要】 关于陶澍的出生地、生年、名字、家庭、婚姻、官场履历、著作、逝世等,人们对此都存在一些不同的说法或盲点,更有一些传说轶闻流传。本文通过深入调查、认真考察、仔细辨析、去伪存真,得出了陶澍生平相关问题的真实结论。

【关键词】 陶澍 生平 传说 辨证

【中图分类号】 K827 **【文献标识码】** A **【文章编号】** 1008—1763 (2018) 04—0122—06

随着湖湘文库《陶澍全集》的出版和安化县陶澍研究学会的建立,越来越多的人在学习陶澍著作,在探讨、研究、宣传陶澍,写出了许多关于陶澍的论文,也出版了几本关于陶澍的传记和文学作品。但是,在这些作品中,对陶澍的生平叙说和分析还存在一些分歧,甚至还有一些盲点。

一 关于陶澍的出生地

2011年10月岳麓书社出版的陈蒲清《陶澍传》说:“陶澍出生地有两说,一说出生在石螃村,一说出生在祖居陶家湾。当地人大多数倾向于出生在石螃村。”“石螃村是一个风景优美的山村。从安化小淹镇渡河到资江北岸,有一条小溪注入资江,叫做石螃溪。沿溪上行,可到达石螃村。”“陶澍在石螃村度过了童年,那里还有他放牛休息的石洞。然而,石螃村虽然风景优美却太偏僻了,所以,陶必铨经常带陶澍外出求学。”^{[1](P10)}石螃村又作石榜村、发榜村;石螃溪亦作石榜溪。

2012年12月,岳麓书社又出版的陶今《我的先祖陶澍》说:“陶澍出生在安化县小淹乡。但关于具体地点,却有几种说法。有的说是陶家溪,有的说是石螃溪,因为这些地方都留有他的遗迹和传说。陶澍在为其曾祖父写的行述中说:‘世居安化一都之小淹陶家溪。’既是世居,则从曾祖父以上数代,就都是居住在陶家溪了。到了祖父这一辈,家里穷得连吃饭都成了问题,择地别居的可能性微乎其微。而父亲兄弟三人分家时,陶澍已经十岁,那么,他出生在小淹陶家溪是无疑的了。至于石螃溪也有陶家老屋,则并不是陶澍这一支的居住地。”^{[2](P7)}陶家溪又称陶家湾。

石螃溪是安化小淹镇对河注入资江的一条小溪流,小到连《安化县志》都没有收录它的名字。陶家湾是石螃溪注入资江口的一个小村落,石螃村则是石螃溪上游的一个小村庄,两地相距约七八公里。

基金项目: 湖南省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(05YB150);湖南省高等学校科学研究重点项目(06A012)

作者简介: 易永卿(1968—),男,湖南安化人,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,编审,历史学教授,研究方向:湖湘文化与伦理学研究。

笔者认为陶澍出生于陶家湾,并在 1995 年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《陶澍评传》中持此说。^{[3] (P7)}陶家湾坐落在资江北岸,隔江与小淹镇相对,风景优美,地沃物丰。笔者认为陶澍出生于陶家湾的理由主要有二。

第一,陶澍著述中的描述。陶澍在《鸿雪因缘图记》中说:“陶子生于资江之滨,其山:大屏、桦香、石峰、香炉、紫云、芙蓉、乌云、神山、梅山、九冈、浮邱。其水:茱萸、石潭、善溪、伊水,上游有七十二滩,下游有二十四港。皆岨岨磅礴,湍洄清冷,实宇宙之奥区,冠盖所不至,红尘所不入。”对照这些地名、山名分析,陶澍的出生地应该是资江之滨、小淹对面的陶家湾。“滨”,指水边,又是迫近、濒临的意思,“资江之滨”,即资江之边。若说是相距资江十来里的石螃村,怎能用这个“滨”字?又如,道光十五年(公元 1835 年),陶澍觐见道光帝时说:“资水流经臣里,两岸石壁屹立于重门,澄潭滌洑,深数十丈,有石出于潭心,方正若印,名曰印心石。”道光问:“尔居此石上乎?”陶澍说:“臣居上游三里许,幼随臣父读书,结有书室,名曰印心石屋,即在此石之北岸。”这里陶澍所描述的居地形势,和陶家湾完全相符。陶澍著述中关于出生地的此类描述,在陶澍诗文奏折中有一二十处之多,而关于石螃溪,则只见到一首五言律诗,该诗只是对石螃溪景物的描述,并没有说明石螃村是自己的出生地,也没有说明石螃村曾是自己的故乡。

第二,资江陶氏族谱的记载。五代后唐同光元年(公元 923 年),陶侃的后裔陶升由江西吉州迁来安化小淹。至明正德、嘉靖年间开始修撰资江陶氏族谱,因年代久远,资江陶氏无法从陶升开始入谱,只能以元代的陶舜卿(公元 1298—1346 年)为资江陶氏的第 1 代祖先,至陶澍共传 16 代。根据族谱记载,陶澍祖先的居地和葬地如下:第 1 代陶舜卿是小淹陶家湾;第 2 代陶日荣由陶家湾迁江南阿丘;第 3 代陶庆源由阿丘迁江南茅坪溪口;第 4 代陶民望仍住茅坪;第 5 代陶尚觐由茅坪迁江南滴水洞;第 6 代陶臣良由滴水洞迁小淹陶家湾;第 8 代陶德度、第 9 代陶立夫、第 10 代陶太和均居于小淹陶家湾;第 11 代陶伯含,即陶耀祖,为陶澍的太高祖,亦居住在小淹陶家湾;以下第 12 至 15 代,即陶澍的高祖、曾祖、祖父、父亲,都居住于小淹陶家湾。上述族谱的记录中,陶澍的直系祖先均未居住在石螃村,陶今认为“石螃溪也有陶家老屋,则并不是陶澍这一支的居住地”,此说当可成立。当然,石螃村和陶澍是有关联的,这一点我们会在后面说明。

二 关于陶澍的出生年月

1992 年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《湖南省志》,以及众多的名人志书、人名辞典,均记载陶澍生于乾隆四十三年(公元 1778 年)。^{[4] (P176)}2008 年,安化政协主席伍湘安在《安化黑茶》一书中采纳上述观点,也认为陶澍生于乾隆四十三年(公元 1778 年)。^{[5] (P6)}其实陶澍的出生年月是非常清楚的,上述说法的产生,在于忽视了公历和农历的换算。乾隆四十三年,为公元 1778 年,一般来说是正确的。问题在于公历和农历在月份上一般有一个多月的差别。陶澍生于农历戊戌年,即乾隆四十三年十一月三十日,这一天已经是公元 1779 年 1 月 17 日。所以说“陶澍生于乾隆四十三年(公元 1778 年)”的说法是错误的。

三 关于陶澍的名字

陶澍,字子霖,号云汀,晚年自号髡樵,又号桃花渔者。其中澍、子霖、云汀,都由其父陶必铨给定,在《二子名字说》中写得非常清楚。问题是,上述陶澍名字中没有体现“字辈”。所谓“字辈”,是表示家族辈分的字(多为名字中间的字),俗称派,也称为班次、班派、班辈、派名等。根据资江陶氏的世系“崇、孝、必、英、贤”的字辈顺序,陶澍曾祖名陶崇雅、祖父名陶孝信、父亲名陶必铨,陶澍应为“英”字辈,当取名陶英澍,其弟当名陶英潜。但是,陶澍兄弟的名字中都没有“英”字,而陶澍妹妹的名字中却有“英”字,为陶珊英。陶澍儿女一代是“贤”字辈,奇怪的是陶澍唯一存活儿子名陶桃,字光表,号少云,也没有体现辈分的“贤”字,而陶澍几个夭折的儿子却分别名椿贤、葆贤、棖贤,都有字辈“贤”字。这一奇怪现象一直无人解答,令人匪夷所思。

四 关于陶澍的家境

1949 年以后,学界讨论历史人物时,往往要为之划定家庭成份,今天看来,是值得商榷的。近年也有学者议论陶澍的家庭成份,

甚至认为不该宣传出身地主阶级的陶澍。历史上没有划定家庭成份之说,后人只能参照土地改革划成份的标准,主观地为陶澍定成份。划成份主要根据家庭的经济情况,而陶澍家庭经济情况变化很大,有一个历史的发展过程,因此,不能给陶澍家庭及陶澍本人简单地定一个成份,也没有必要。但了解陶澍的家境对于客观分析历史人物还是必要的。

1984年,魏秀梅在台湾出版的《陶澍在江南》一书中说:“陶澍的先世,在中国旧社会中,堪称为积善之家。”^{[6] (P13)}“积善之家”的说法符合历史真实,但是,这是从陶澍先人的品德定位的,而不是讲经济情况。陶今说:“从陶升入迁安化到陶澍的曾祖父文衡公数代,家境时起时落,但总以务农为本……家境到了(陶澍)祖父寅亮公这一代竟是一贫如洗了。”陈蒲清认为陶澍是“农家子弟”,“陶家以农为生,到第十一代陶耀祖(公元1298—1346),字伯含,家庭富裕起来,曾经购买田庄十多处……后来,陶家生齿日繁,家道也就逐渐不太富裕了。到了陶澍的祖父陶寅亮这一代已经是一个清贫的农家了,荒年甚至食不果腹……陶澍的父亲陶必铨是一个穷秀才……家中经济陷入困境,陶家以野菜稀粥度日……住房也很差……幼年的陶澍常常参加劳动,砍柴放牛”。以上说法和陶澍家庭的实际情况基本相符,没有给定成份,但有些形容似有过头。

陶澍家庭经济情况有一个历史的发展过程,根据现有资料,陶澍以上15代祖先的基本情况,从第一代陶澍的先祖陶舜卿到第10代,即陶澍的太上高祖陶太和,都是亲自耕种的农民,从迁徙频繁的情况分析,都缺少土地等最基本的生产资料,家境比较贫穷。因此,说陶澍的先祖是“农民世家”,当是历史事实;说陶澍是“农家子弟”也可以。

到第11代即陶澍的太高祖陶伯含,则家庭经济情况发生了根本变化。王焕鏊《陶文毅公年谱》称其“手置十余庄”,能够拥有十多个田庄,以土改标准来看,当属地主阶级。陶伯含富裕是有原因的。首先王焕鏊称其“有干略”,陶氏族谱则说他“秉性纯明,超然有志略”。说明陶伯含是一个有才干、有能力、有志气、善划算、有远见的能人。其次,族谱称赞陶伯含品德高尚,诚以待人,乐于助人,应是善于团结人,在农村有威信、有号召力的人物。再次,陶伯含处于一个好的时代,即所谓“鼎革之初”,清初统治者比较重视恢复发展生产,为农民发家致富提供了一定条件。到陶伯含的儿子,即陶澍的高祖陶翎先,家境更加富裕,族谱说其“资产日饶”,又在石螃溪购置田庄、山庄;家有“奴仆十余人”,“每往佃舍,孙四五辈骑马尾之”,完全是大地主的派头。但是,陶翎先“为人开爽豪迈,不畏强御,而存心极厚,待人极恕”,不失“积善之家”的本色。其子陶文衡即陶澍的曾祖,仍是富裕之家。陶今说:“文衡公除了务农,一年还要做一回生意人,将安化独有的黑茶运到武汉去卖。生意不大,却十分辛苦。为了几担茶他要翻越百数里路的山岭,再浮急流险滩的资江,过洞庭,入长江,始得到武汉。”其实,这些话只是文学语言。陶澍在为其曾祖写行述时说文衡公“时或市茶汉镇,旅邸无事,辄结网以习劳”。当时,安化人在汉口做茶生意的不少,汉口鹦鹉洲的安化同乡会成员多为茶商。陶澍曾为之题联:“安邑擅经营,鹦鹉洲前,聚会依然桑梓地;化工资贐育,芙蓉岭外,出山尽是栋梁材。”茶商都是富家大户,一次生意最少是一船茶叶。所谓“担茶翻越百数里路山岭”的都是茶农,而绝不是老板。如果论成份,这时的陶家可能是地主兼工商业主。总之,陶澍曾祖以上三代,确是大地主。到陶文衡的儿子,即陶澍的祖父陶寅亮时,陶家已经开始破落,正如我们老祖宗的古训,“君子之泽,三世而斩”。陶家破败的原因,一是陶文衡生了六个儿子,一份家产各得六分之一,当然没有先前富裕了。二是陶今所说,“老实巴交的祖父生性淡泊,不善农事”,坐吃山空。当然也不是“一贫如洗”,俗话说“瘦死的骆驼比马大”,若比照土改时的标准,也应算是一个破产地主家庭。根据以上陶澍祖父以上四代的情况,陶澍应定位于“地主阶级的孝子贤孙”。

陶澍的父亲陶必铨已经没有田产,“住房也很差”,靠设馆授徒维持一家生计,灾荒之年则“要以野菜稀粥度日”;但陶必铨是一个秀才,政治上有一定地位,经济情况也比贫困农民好得多,如果放在土地改革时期,应该是贫民,或自由职业者,总之是靠自己的劳动收入来维持一家的生计。这时尚未成年的陶澍,并不要“常常参加劳动”,而是以读书求学为主。至于后来陶澍成为一家之主,进入官场,正常的俸禄十分丰厚,灰色收入更是一笔糊涂账,老家有官厅,外地有别墅,尤其广有田土,连桃江都有陶澍的庄园。这时的陶澍当是大地主,而且是官僚大地主阶级。

整体来说,给历史上的陶澍划定成份是没有必要的,今天纠缠这个问题,是一种极左思维。我们研究、评价历史人物,是根据其人的言行所产生的作用来评判。凡是推动了社会进步、促进了经济发展的,我们就应该肯定;凡是重视人民群众、为老百姓做了好事的,我们就应该褒扬。这两条是颠扑不破的铁律,是评论历史人物的根本。

五 关于陶澍的婚姻

陶澍的婚姻本来非常清楚,无须考证,但是却被说得最混乱、最离奇。其中最能吸引人的即“婢女代嫁”的故事。“婢女代嫁”的创作者为梁恭辰(公元 1814-?年),福建福州人,曾任温州知府。梁恭辰是梁章钜的第三子,而梁章钜则是陶澍的同科进士,官场契友。梁恭辰在他的笔记体小说《北东园笔录》中写下了关于婢女代嫁陶澍的故事。现将原文引录如下。

前两江制府安化陶文毅公,与家大人壬戌同榜进士,同官京师,最相契厚,两家内眷时有来往。先母郑夫人尝语余曰:“陶家年母右手之背有凸起一疣,问其故。则蹙然曰:‘我出身微贱,少常操作,此手为磨柄所伤耳。’”先母亦不敢追问其详。后家大人闻于楚南知好云,文毅少极贫,初聘同邑黄氏女。有富翁吴姓者,闻黄女姿色,谋夺为其子继室,以厚利诱黄翁。黄顿萌异志,迫公退婚,公不可,黄女之母亦不愿。而女利吴之富,意已决,又其父主持甚力,遂誓不遁穷生。家有养婢愿以身代,女之母许之,文毅亦坦然受之,初不相疑,即今之膺一品夫人诰命者也。后吴姓恃富,又占曾姓田,两相讐斗。吴子被殴死,吴翁亦继卒。族中欺黄女寡弱,侵吞其田产殆尽。时文毅已贵显,以丁父忧归里,始悉其颠末,怜黄女在窘乡,赠之五十金。黄女愧悔欲死,口抱银号泣而不忍用,旋为偷儿窃去,忿而自缢。闻文毅今尚每年周恤其家不倦云。按此事传闻情节小有歧互,而大致则同。忆文毅与家大人同官吴中时,朱文定公由浙江学政还朝,亦壬戌同年也。舟过苏州,同官演剧,公觞之,文定令演《双冠诰》,文毅至泪承睫不能忍。文定私语家大人曰:“此我失检,忘却云汀家亦有碧莲姊也。”是日,上下观剧者百十人,无不目注文毅者,众口宣传其事,益信。

文中“朱文定公”即朱士彦(公元?-1838 年),江苏宝应人,陶澍同科进士,扬州学派代表人物之一,官至工部、吏部、兵部尚书。20 世纪 70 年代,台湾人高阳(公元 1926-1992 年,本名许晏骅,字雁冰,出身于浙江钱塘望族,一生著作九十多部)据此写了文艺小说《印心石》,叙述了以“婢女代嫁”为背景的虚假故事。由于高阳的名气,《印心石》又多次印刷,故事更广为流传;21 世纪初,北京三联书店将《印心石》再次在大陆出版,亦多次印刷,传播更广。近年,陈蒲清的《陶澍传》和陶今的《我的先祖陶澍》都以确凿的史实介绍了陶澍的婚姻,否定了“婢女代嫁”的传闻。

严肃的学术著作不能用传奇故事取悦读者,文学作品也不应以传说轶闻来故意伤害真实的历史人物。婢女代嫁不仅伤害了陶澍的发妻黄德芬,也伤害了忠厚的陶澍岳父黄崇榜。当然,文学作品允许虚构,关于陶澍婚恋有许多版本,只要没有歪曲历史人物,作为历史小说应该可以容纳一些传闻轶事,以进一步丰富历史人物的形象。这有一个陶澍读书时期的传说。陶澍 15 岁时随父往桃江读书,于桃花江遇一流落在旅店的安化女子,通过对联问难,谈诗论学,相互仰慕。三年后,中了秀才的陶澍再来桃花江旅店,女子已逝,只留下半边对联“寄寓客家,牢守寒窗空寂寞”,却无人能对下联。陶澍见后十分伤感,挥笔对曰“迷途远避,退还莲迳返逍遥”,并题横批“安化第一才女”。此对上联是说女子父母双亡,在舅舅家住着,就像寄寓客家一般;自己孤身一人,独坐香闺,心中寂寞,何时是出头之日?下联则说人生在世,仿佛在迷途之内,如同大梦一场;要躲开迷途,避开“莲迳”,则只有出家,才可逍遥自在。“莲迳”,在浙江宁波金峨山,有千年古道,呈“S”形盘旋而上至金峨寺,登上寺中的观音阁,则胸襟辽阔,可观海天奇景。陶澍的下联从积极意义说,是鼓励女子应有勇气走出迷途,不怕艰险,争取前途。从消极理解则是出家为尼,亦可逍遥自在。

六 关于陶澍的官场履历

道光十九年(公元 1839 年)五月,即陶澍逝世的前十天左右,陶澍抱病为《资江耆旧集》作序,最后写清楚了自己官场三十多年的履历:“诰授荣禄大夫、太子少保、兵部尚书兼都察院右都御史、总督江南江西等地方、提督军务粮储、操江兼辖江南河道(管理两淮盐政)、统率文武、赏戴花翎;前安徽巡抚兼提督衔、江苏巡抚兼署江苏安徽学政、安徽布政使、福建按察使、山西按察使兼署布政使、四川分巡、川东兵备道、吏科掌印给事中、户科给事中、巡视南漕、察院掌陕西道江南道御史、巡视中城、巡视东城、察院稽查储积仓银库颜料库、嘉庆庚午四川大主考、甲戌会试同考官、丙子顺天乡试、丁丑会试内监试、翰林院编修兼国史馆总纂。”这都是陶澍所任的官名和职衔,可分为两个部分:“赏戴花翎”之前是陶澍写序言时所担任的职务;其后则是陶澍中进士后历任官职。上述所有官职又有实职、虚衔等许多区别。

其中,陶澍官场中的几个关键官职是:巡视南漕、川东兵备道、安徽布政使、巡抚、总督、盐政。嘉庆二十年(公元 1815 年),38

岁的陶澍奉命巡视南漕,半年时间催运五百多万石漕米,其办事能力崭露头角,引起了朝廷重视。嘉庆二十五年(公元1820年),43岁的陶澍任川东兵备道,其能力和品德得到朝廷重臣、四川总督蒋攸钰的赏识,并因此为道光帝所知,故一年后升任安徽布政使,成为从二品的地方大员。陶澍在安徽理清了几十个纠缠不清的钱粮亏空事件,显示了其处理经济问题的超强智慧与能力。道光帝随即提拔其为安徽巡抚,旋调更加重要的江苏巡抚。道光十年(公元1830年),陶澍升任两江总督,旋兼两淮盐政。盐税是清王朝最重要的财政收入,两江总督是清王朝最重要的地方官员,位居一品,掌管清王朝的经济命脉,一般多由满人贵族、皇室宗亲担任。据萧一山《清代通史》统计,从康熙四年(公元1665年)设置两江总督,至道光十九年(公元1839年)陶澍病逝卸任两江总督的174年中,共有56人担任两江总督,人均任期3.1年。56位两江总督中,满人有39位,汉人有17位。其中满人贵族尹继善以11年任期名列第一,陶澍以10年任期列第二名。陶澍在总督任上曾多次受到处分,朝廷部议均为“降级调用”,道光帝则一律改为“留用”,可见皇帝对陶澍倚仗之深。

此外,道光元年(公元1821年)八月,陶澍调任福建按察使,九月,陶澍离山西赴京觐见道光帝。十月,道光帝擢陶澍为安徽布政使。这时陶澍尚在北京,立即南下赴安徽,并没有到福建任按察使。还有“操江”一职,多为人所不解。“操江”亦为官名,始于明代,在都察院置提督操江一人,以副金都御史充任,住所在南京,主管上、下江防务。清随明制,康熙初年改隶总督,为武官从一品。

七 关于陶澍的对联

陶澍和梁章钜是嘉庆七年(公元1802年)同科进士,当时陶澍被称为“诗坛领袖”,梁章钜被称为“联坛宗师”,都以诗歌、对联享誉于时。《陶澍全集》收录有对联97首,另有9首因无实证,则作为“附载”收入。“附载”的第一首是:“红薯、包谷、菟根火,这点福老夫享得;齐家、治国、平天下,那些事小子为之。”据吴恭亨《对联话》,录有刘墉幼年对联一首,与之相似,只是上联的前七个字为“粗茶、淡饭、布衣裳”。刘墉(公元1719年-1805年),字崇如,号石庵,山东诸城人,官至吏部尚书、体仁阁大学士。刘墉长陶澍60岁,陶澍中进士、任编修时,肯定知晓、甚至会见过刘墉这位朝廷重臣;但十来岁的陶澍却决不会知道刘墉。问题是刘墉此联是否传到了偏僻的安化,如果刘墉此联已经广为传播,则此联有可能是陶澍的仿作,而将“粗茶、淡饭、布衣裳”改为“红薯、包谷、菟根火”。“红薯、包谷、菟根火”确是安化农村的真实写照,特别“菟根火”为安化小淹、江南一带农村冬天的一大特色,别的地方是很少见的。

《陶澍全集》收录有赠刘龙、李云将军的两首对联,均为台湾陶先进老人所藏,为陶澍笔迹。原联题“圆明园旧联句”,并分别题“刘龙将军雅正”“李云将军雅正”。刘龙、李云位至将军,但一直没有找到他们的资料,是否就是传说中的刘龙、李豹?此外,《陶澍全集》收录《赠黄书怀》《赠荆竹溪黄某》《赠荆竹溪黄某之二》《赠杨农六弟亲家》《赠芷崖二兄弟亲家大人》等对联,这些对联的赠授者目前均无从了解。^{[7] (P383)}

八 关于陶澍的逝世

在有关陶澍的传说中,流传最广的当是“婢女代嫁”和“死后斩头”。陈蒲清在《陶澍传》中引了“斩头”的传说。陶澍错斩了严佑生,其子为父报仇,要取陶人头。为避两家世仇,陶澍答应道光皇帝,死后准其子取头祭父。陶澍死后,子孙造49口一模一样的棺木,以图蒙混过关。但在棺木出门时,严子发现一口棺木上停有一只苍蝇,遂开棺取头而去。陶氏子孙只得一金头纳于棺内,为防人盗墓,49棺分置四面八方,秘密而葬。陈蒲清强调,“这个传说根本不符合历史事实”。可是传说的流传却很广泛,而且版本很多,只是严佑生这个人名不同:有的说是年运生,陶稳固说是盐运使,《陶澍私访南京》中则说是朱茂臣。笔者曾查阅一些历史人物、人名辞典,都没有年佑生、年运生、朱茂臣的名字。我想能够通过道光帝允诺向两江总督报仇的人,其地位和名气当与陶澍相当,甚或过之,否则是不可能的。而且,陶澍死后被斩头,是惊动朝野的大事,历史上岂能没有记载?

对于这个传说的来源,也是众说纷纭。个人认为,这个传说是扬州垄断盐商恶意编造的。陶澍整顿盐政,沉重地打击了垄断盐商的行径。据时人黄钧宰在《纲盐改票》中说,扬州盐业垄断纲商包办盐政以来,积累了巨额财产,富可敌国,高楼大厦,画梁雕栋,

文酒竹歌,殆无虚日。陶澍改票后不及十年,“高台倾,曲池平,(盐商)子孙流落,有不忍言者,旧日繁华,剩有寒菜一畦,垂杨几树而已”。因此,他们想方设法攻击陶澍。陶澍也因此报告道光帝:“蠹商被革,干俸全裁,从前之每年坐食数千金、数百金者,俱多怨恨,吹楚多端。兼闻扬人相斗纸牌,绘一桃树,另绘一人为伐树状,以寓诅咒,其切齿于臣若此。”时人欧阳兆熊、金安清亦在《水窗春呓》中指出:“陶文毅改两淮盐法,裁根窝,一时富商大贾顿时变为贫人,而依盐务为衣食者亦皆失业无归,谤议大作。扬人好作叶子戏,乃增牌二张:一绘桃树,得此者虽全胜亦全负,故人拈此牌无不痛诟之;一绘美女曰陶小姐,得此者虽全负亦全胜,故人拈此牌辄喜,而加以谑词。”当时,这类对陶澍的人身攻击已经上达天听,都未能实现打倒陶澍的阴谋,故而在陶澍死后,又造谣惑众,以泄私愤。

参考文献:

- [1]陈蒲清. 陶澍传[M]. 长沙:岳麓书社, 2011.
- [2]陶今. 我的先祖陶澍[M]. 长沙:岳麓书社, 2012.
- [3]陶用舒. 陶澍评传[M]. 长沙: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, 1995.
- [4]湖南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. 湖南省志[M]. 长沙:湖南人民出版社, 1992.
- [5]伍湘安. 安化黑茶[M]. 长沙:湖南科技出版社, 2008.
- [6]魏秀梅. 陶澍在江南[M]. 台北:台湾“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”, 1985.
- [7]陈蒲清. 陶澍全集[M]. 长沙:岳麓书社, 2010.